

川谣·川灾·川政

——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

黎志辉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后,陕甘善后和四川整军先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奠定抗日后方的两大战略。与其他省份的统一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川谣”和“川灾”对川政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诱迫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频派代表入京高调辟谣,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统一”的话语优势,并较为顺利地推行了中央奠安川局的方案。四川整军虽因抗战爆发而仓促收场,但政治高层与社会舆论联袂“息谣”和“救灾”,却为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结束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塑造了有利统一的心理条件。

关键词 川谣 川灾 国家统一 蒋介石 刘湘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渗入四川后,刘湘主政下的四川省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且因1936年初的康泽事件,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①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面力谋陕甘善后,一面加紧控制四川。宁川^②之间的政治博弈,在重灾之际人心恐慌的四川社会,不时激起各种谣言,并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密切关注。“国家中心论”^③主导的川政舆论,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渴望团结抗日的民族意识一脉相连,实则对游移于开战边缘的宁川双方都施加了道义压力。显居劣势的刘湘,尽管对蒋介石“削藩”手段心防难消,却终顺应舆情,接受整军。抗战前夕的四川乃以非军事的另类方式,由“国中异乡”^④逐步化为容国基地。川谣、川灾和川政,在西安事变与七七事变交接的特定时空,构成一组多元互动的奇特结合,并最终升华为国家建构和民族抗战的时代主题。

一

1937年入春以来,中国西南、西北的川甘陕黔桂五省均遭重灾袭击,即连素称富庶的广东亦闹

① 1936年初康泽“打倒刘湘”的鲁莽行动,被刘湘抓住把柄。此事虽迫康泽去职,但蒋刘关系却出现严重危机。详见[美]罗伯特·A·柯白著:《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53页。

② 本文沿用“宁”、“川”概念,主要为便于表述南京国民政府与四川省政府之间或蒋介石与刘湘之间较为复杂的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③ “国家中心论”主要以天津《大公报》的政治言论为代表,其发轫与形成参见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第五章第四节,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④ 四川在1935年中央军入川之前被全国舆论视为“国中异乡”。参见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粮荒。各省迭电南京国民政府告急请赈,而四川灾情“为最惨重”。^① 川省当局正式公布的灾民数量,最高达至 3500 余万。1937 年 4 月,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视察川灾时,在重庆城郭亲见路毙 10 余人,以致感言“野有饿莩一语,昔仅见之于书,此次来川,目击惨状,殊觉惨然”。^② 四川有谚云:“天干出谣言”。“乡间因干旱关系,谣言极多。不是说观音大士与某人投梦,因为人民作恶,还要干三年;就是说农民未把戊忌,得罪了土地菩萨,这里出了活佛,那里又有菩萨在显圣。因此种种谣言,于是大家集款建醮祈雨,表示忏悔,求菩萨保护,希望早下雨,普救众生”。^③

灾荒谣言又与政治谣言混杂共生。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刘湘之间的脆弱关系岌岌可危。宁方驻川部队和刘湘所部川军在重庆、成都两地各筑工事,互相警戒,战事几乎一触即发。尽管宁川不睦已是公开的秘密,然而双方对此均是讳莫如深,不便公诸舆论。在军政统一和民族复兴之类的冠冕话语之下,透过各方渠道流传而出的关于宁川冲突的消息和揣测,乃以所谓“谣诼”的形式进行传播,并借新闻媒体的息谣报道及对赈济川灾的强烈呼吁,不断释出国人对此问题的紧张心理和舆论压力。

川省灾情在 1936 年夏冬之季已较严重,一些县份甚而三、四年连续遭灾。1936 年阴历年后,全省民食日趋紧张,各地粮价群起上涨。^④ 武胜县于 1 月 19 日,发生数十名饥民因掘泥埋死洞中的惨剧。宜宾县,“正月十四日起挖仙米(观音土)的人一天多一天,前两天是几乎有一千人”。^⑤ 连年战乱和灾荒累积造成的全省粮荒直接引发灾情,由此导致大量灾民饿毙^⑥。“钱荒”则为致灾的另一重要原因。民元以来四川内战频仍,币制紊乱,金融枯竭。1935 年中央军入川后,财政部限期以八折收销数额达三千余万之巨的川省地钞,同时依纯银含量收换杂币,引起市面极度恐慌。^⑦ 收销地钞后,川省金融仍属混乱,一为中央法币不敷流通,二是中央法币并无信用,商民不愿行使。^⑧ 迨至 1937 年春,川省“钱荒”已趋严重,边远县份尤感现金缺乏。^⑨ “钱荒”之下,粮食交易活力不足,市场调节功能萎缩。多数县份米价在一月已由平时每斗一元左右涨到三至五元,此后灾荒愈重,而涨势却再难走高,实为川灾一大奇观。受灾各县所储粮食,本不足以供应民食,“然此少量之数,复难出仓,严重程度,诚堪忧虑”。^⑩ 广为人知的旱灾,造成农民小春歉收,并极大地加剧了灾情扩散和社会恐慌。此外,一些县份还发生水灾、飓风、疫情等。

迅速蔓延的川灾,显然不如 1936 年西安事变后蒋刘矛盾引发的川谣那样吸引舆论关注。西安

① 《华洋义赈会下月初在赣开会,石芦渠工程继续开办,全国各地灾情调查》《大公报》1937 年 4 月 17 日第 4 版。

② 《朱庆澜昨飞成都,促省府筹款百万》《大公报》1937 年 4 月 22 日第 4 版。

③ 益坚编:《四川旱荒特辑》《四川月报》第 10 卷第 4 期,重庆中国银行 1937 年 5 月出版,第 43 页。

④ 川省粮荒及粮价上涨情形,参见《各县米荒概况》,《四川月报》第 10 卷第 1 期,重庆中国银行 1937 年 1 月出版。另可参见《四川饥民啸聚发生抢米惨剧,各地米行多闭门停业》,《川省米荒,省府购皖米接济,荣昌群众抢米风潮》,分载《大公报》1937 年 1 月 31 日第 10 版、2 月 28 日第 4 版。

⑤ 益坚编:《四川旱荒特辑》第 96 37 页。

⑥ 粮荒致灾与时人普遍的“旱灾”认识显有一定差距。《华西日报》记者金德璋在随同财政部专员曹仲值视察营山县时,该县春季收成不能算坏,但灾民占全县人口 80% 强,可见“没有了龟裂的田土,并不是没有灾呀”。川省多数地区从 4 月底开始间有雨情,官方和舆论大多认为旱灾缓解,但金德璋却认为“目前因为有了雨,灾民的恐慌情绪虽已好转;而无饭吃的现象,还是有待于目前的振济哩!”参见金德璋:《川灾视察记》,出版时间不详,第 25 47 页。

⑦ 川省金融界对中央限制金融活动和地钞兑现的强烈不满,参见《四川民众金融自救团成立宣言》(1935 7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财政经济(五)金融货币,第 639 页。当时亦有报载:“法币实施,吾川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转见赵星洲:《四川币制混乱的贻害》,《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9 辑,第 178 页。

⑧ 王廷科:《参谋团入川纪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第 196 页。

⑨ 川省“钱荒”情形,参见《万县银风奇紧》,《成都钱荒及救济情形》,《泸县银根不活》,《内江银风坚峭》,《成都造币厂铸造银铜币概略》,《万县铜元缺乏》等文,《四川月报》第 10 卷第 1 期,重庆中国银行 1937 年 1 月出版。

⑩ 四川粮食调整委员会:《四川省廿五年至二十六年旱灾视察报告》,出版时间不详,第 23 页。

事变爆发后,刘湘属下建议接管包括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在内的宁方驻川设施和部队,此议虽未实行,蓉渝两地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宁方驻渝部队和刘湘所部川军在重庆浮图关一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昼夜赶筑工事,“其紧张程度,真如千钧一发,只要任何一方,任何一人放出一枪,或者哪怕是走火,都会引起一场破坏性极大的战争”。^①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因为与驻渝川军师长许绍宗和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等是同学,“每日低首下心和他们周旋,以期消弭祸端”。^②

蒋介石自西安被释后,对张杨部队“明言和平解决,而暗调大军压迫”。^③除韩复榘、刘湘、李宗仁、白崇禧外,各省均电促杨虎城等遵照陕甘军事善后办法。此一期间,刘湘频频联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和云南龙云,拟联名通电中央采取政治途径处理陕甘善后。阎锡山虽对不愿发生内战极表同情,但却认为“此时联名电京,反易启国人之误会,而致惊疑。弟现正努力促进和平,尤不宜有特别表示,致塞途径,兄当以为然也”。^④1月15日,刘湘与李宗仁、白崇禧正式联名通电,吁请中央“寻政治解决之途径,高瞻远瞩,以释猜疑,急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勿得逼之过剧,相煎太急”。^⑤刘湘对陕变及其善后的态度,显有反对中央之嫌疑。“因刘氏(刘湘)巧、真、删各电之发出,致引起不少谣言,考谣言之成因,由于杨虎城之歌电,曾有人印为传单,在成都市上发现,而西安复广播四川广西等省均有代表在陕”。^⑥贺国光虽电蒋介石,刘湘“尚无他图”,但亦认为“届时演变难测”。^⑦后由何应钦之弟何辑五赴蓉“促其觉悟”,又经“连日渝蓉两方分途解说”,并接驻蓉人员报称“李白近又电约甫澄(刘湘),如中央对陕事用武力解决,则合川桂兵力,武装调停。而甫澄复李白电,则谓……若用武装调停,便系破坏时局,不敢苟同”,“且将与李白往来电文宣示于人,何委员辑五曾寓目”。^⑧至此,刘湘与李白联名通电主张政治解决陕事的风波暂且告一段落,而大公报记者亦观察到“川中谣息”。^⑨

二

蓉渝两地的警戒状态迄未解除。尤其是刘湘竟然侦悉一伙“不逞之徒”定于1月27日集合暴动,而据供彼等听命于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主任李明灏。^⑩李明灏的大胆举动不啻使其成为第二个康泽。时隔多年,贺国光对其敌视刘湘的行为,仍深表困惑。他在《八十自述》中说道:“教育长李明灏系中央任命,此人小有才而不识大体,竟被流言煽动,擅作主张,在分校附近街口构筑工事,在城墙上建筑炮台,本来无事而庸人自扰,致引起刘部误会,态势顿形紧张,最不可思议者,彼居然一

① 王柔德:《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罪恶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96页。

② 华觉明:《话说贺国光》《武汉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总第40辑),第91页。另可参见吴晋航:《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前后》,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19页。

③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呈孔祥熙何应钦转述于学忠真电内容》(1937.1.14),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2册——重要函电(下),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129页。

④ 《阎锡山主任复刘湘李宗仁称正努力促进以政治方法解决电》(1937.1.14),《西安事变史料》第2册,第128页。

⑤ 《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吁团结对外通电》(1937.1.15),《西安事变史料》第2册,第349页。

⑥ 《四川饥民啸聚发生抢米惨剧,各地米行多闭门停业,川中谣息,何辑五已返京》《大公报》,1937年1月31日第10版。

⑦ 《贺国光电蒋中正查刘湘等通电请中央入陕部队停止西进等情尚无他图惟平时虽咸遵均训处理事务但届时演变难测请求如何因应为宜》(1937.1.1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90300006171。

⑧ 《贺国光上蒋委员长报告川局稳定宜注意李白电》(1937.1.26),《西安事变史料》第2册,第154页。

⑨ 《四川饥民啸聚发生抢米惨剧,各地米行多闭门停业,川中谣息,何辑五已返京》《大公报》,1937年1月31日第10版。

⑩ 参见乔诚、杨续云:《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190页。李明灏(1897—1980),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少将师长,南京中央军校教育处长、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主任等职,其生平事迹详见姚思奇编:《李明灏将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再请求余发给步枪七千支、子弹三百万发、炮弹三百发,为作战准备。”贺指出:“况当此谣言孔多之际,社会已感不安,枪械一经颁发,岂非将谣言加以证实,使局势益趋紧张,或致不可收拾,殊属不智已极。”^①其实,当时的重庆方面亦是风声鹤唳,杀气阴腾。重庆行营墙外,“有人投掷炸弹,而市内马路两旁,亦恒有遗弃炸弹误伤人命之事发生。何人所为,既难证明,而刘湘方面,则谓系失意份子,图造成事实,以恶化中央与地方之情感”。^②2月间,有关刘湘调防部队情形和拟仿广西整编保安队的报告,接连呈至蒋介石。蒋曾电令贺国光和行营公路监理处处长胡嘉诏,速查川湘、黔成、川鄂三公路修筑近况,并命贺国光每月列表呈报全川各部队调防移动情形。成都且传言薛岳军及第五师业已开蓉。

由于事态尚未明朗,川谣对宁川双方都造成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对宁方而言,谣言为刘湘图谋起兵造反;对川方而言,谣言则为中央倒刘有所行动。亦真亦假、真假难辨的各色谣言,在当时军事对峙的情势下,随时可能高度刺激渝蓉两地军政人员本就崩得铁紧的敏感神经,由此则将诱发宁川彻底决裂。3月3日,贺国光与川军师长许绍宗,因渝市日来谣言繁兴,治安机关虽一再辟谣,传说仍多,故联袂赴重庆城外浮图关一带检阅各部队所筑工事,“下令一律撤除,以释群疑”,并定于3月4日宴请各长官联欢,军界团长以上均被邀请。3月4日,贺许“息谣”联欢,贺并通令禁止夜间打靶。^③3月8日,《大公报》据重庆航讯报道:“此间谣言,自经行营贺参谋长及刘湘部第161师长许绍宗会同招宴本市军政长官及驻渝师旅团长等以资联欢后,市面谣言略息。”记者连日走访各方,“综合观察此时川中无论何界均愿维护统一,谣言虽盛,均断其终属谣言”,又据成都来人所谈,“蓉市极为安静”。

然而川谣并未如上述所说那样令人乐观。四川因旱灾日久,各地火警迭发。重庆3月7日一日间发生火警三次,“正月以来,已发生火警十余次之多”,“今晨二时许成都三桥南街亦发生火警,恐又予造谣者之资料矣”。^④《冀东报》更于稍后披露,“川省刘湘所部,八日与在川监视之宁军,发生冲突,死伤数百人,因此事为宁府之各地新闻检查机关扣留,故各报得以发表者甚少。现川省各方军事行动,有加无已。惟刘湘以一面表示服从,一面积极备战之策略,以应付现势下之川局,态度极为不稳”。^⑤

对3月初的宁川冲突,贺国光虽然不欲事态扩大,但如刘湘所言:“委员长远隔四川数千里,他所得的报告,与我及元靖(贺国光)它(他)目睹的事实,想有甚大的距离。”^⑥刘湘在与蒋介石同样面对川谣的舆论压力时,显处话语和心理劣势。蒋介石挟中央以令诸侯,甫经西安事变的一惊一释,国内人气愈见高涨,甚可称作国家统一的化身。刘湘作为民元以来四川军阀混战的代表人物,

① 贺国光:《剿匪安川与刘湘》(节自《八十自述》),周开庆编著、刘航琛审订:《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年版,第194-195页。

② 《四川问题之症结》(1937.5.24),季啸风、沈友益主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该书所载资料的时间系据文中所盖印戳判定。经比照《大公报》《益世报》和《申报》,其与原刊日期似应一致。惟查此则资料,原载《益世报》书中误作《大公报》)。

③ 《短评:川情》,《大公报》1937年3月7日第4版。

④ 《川谣渐息》,《大公报》1937年3月8日第3版。

⑤ 《传四川刘湘态度不稳,张群飞川调查真相》(1937.3.14),《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第2页。报导所言宁川冲突的发生时间为误传。其实,自3月3日开始,《大公报》首次密集关注“川谣”,以及贺许之间不同寻常地联袂辟谣,正向外界暗示了宁川发生冲突。另可参见《贺国光电蒋中正以周成虎属162师分驻重庆日前忽在各地筑工其他川军并未如此令停止构筑并铲除已筑工事双方渐次融洽等文电日报表》(1937.3.3)、《钱大钧呈蒋中正关东军派人至山西活动又杨虎城派员驻肤施联络共党及中央军与川军在重庆发生纠纷和日本拟在海南岛设领事馆等情报日报表》(1937.3.4),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200480015、002080200492025。

⑥ 刘航琛述:《戎幕半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注出版年],第188页。

舆论形象本就不佳,其与蒋介石之间又早已形成中央与地方、领袖与职属的等级关系,而且“刘氏纵欲有所行动,亦苦无可以号召之理论”。^① 3月11日,刘湘以重庆多谣,特派建设厅长卢作孚飞渝,面呈其拥护中央之赤诚^②,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③亦派办公厅长韩德勤飞蓉谒刘湘解释一切。卢作孚抵渝后,径赴行营,晋谒贺国光,并分访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川军师长许绍宗及警察局长何北衡等人,面告刘湘拥护中央态度。卢且携有刘湘呈蒋介石亲笔函,拟于16日乘巨型机东行谒蒋委员长。邓汉祥回忆,刘湘初派建设厅长卢作孚代表前往谒蒋,意在探明蒋的意旨,再设法应付。但卢晤贺国光后,“因贺说卢同刘的关系不够,仍回成都。因而刘又改派秘书长邓汉祥前往”。^④

三

3月18日,贺国光、邓汉祥、卢作孚联袂飞京。“贺自二十四年率参谋团入川以来,此为第一次晋京报告川情”,何应钦、何辑五及军政各界百余人到机场迎接。^⑤宁川双方高层人士在蓉、渝、京等地的高调辟谣,不仅使川谣一跃而成国内时事中仅次于陕甘善后的舆论焦点,同时也提高了国人对川灾的关注热度。邓汉祥忆及,他到南京后“飞机场有五、六十个新闻记者包围他,因当时特务散布谣言,说四川要造反,故记者特别注意”。^⑥对川谣原乏敏感的《中央日报》此时开始详为报道贺邓卢三人的辟谣之行,其发文称“邓谈外间所传均属无稽”。^⑦翌日的《大公报》则将陕变后的甘肃与川灾中的四川并列,刊发了本年有关川灾的第一篇社评《从速救济川甘灾民》。该篇社评主张救济灾荒的根本之图,首在“西安事变后发生之和平统一,务期有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上之妥善的开展”,次则“川甘两省之军政现状,须彻底改善”。社评还提出,“最主要者,在中央能督责各该当局切实整理政治军队,并尽可能将军费由中央统筹”。

3月19日,贺邓二人晋谒蒋介石。邓汉祥代表刘湘报告川政近况,顺便说明谣言之起因,并谋行营与川省府之完全合作,且川灾严重,而省库又极拮据,故拟请中央设法救济。贺国光则详陈刘湘“拥护中央诚意”。^⑧3月21日,《中央日报》且报道“刘湘二十日通令所属各部卫兵禁止无故警戒,阻止行人通过”。^⑨同日下午,四川旅京同乡会开会欢迎邓汉祥、卢作孚等。邓报告川省近况及救灾办法后,同乡代表发言“对邓有所质问,并表示川军费庞大,民众负担过巨,川当局应彻底觉悟,认识民族危机”,以致卢不得不解释“川政进步迟缓,确系事实,但亦有其苦衷。刘主席实无拥兵自卫之思想,请旅外同乡信赖”。^⑩

在息谣舆论当中,亦有不谐之声。据《冀东报》3月24日南京专电,“川省问题发生后,宁府方面,迄在讳言中,并利用统制下之新闻检查机关,一律严禁各地新闻纸,关于四川真实消息之刊

① 《灾深谣重的川局,物价飞涨斗米逾五元,一周来成渝谣炽的原因》,《大公报》1937年5月19日第3版。

② 《川省谣言可望渐息,卢作孚对记者谈川局》,《大公报》1937年3月15日第3版。

③ 3月10日,贺国光暂代重庆行营主任。

④ 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65—66页。文中“1937年6月中旬”显为误忆。邓汉祥所言情节,正与3月中旬贺邓卢三人群谣行程相符。另,卢作孚在6月10日确曾代表刘湘由蓉抵汉,转庐谒蒋,但未经重庆中转(《大公报》1937年6月11日)。

⑤ 《贺国光等昨日抵京,邓汉祥卢作孚同行,谒蒋院长报告川情》,《大公报》3月19日第3版。

⑥ 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66页。

⑦ 《贺国光昨偕邓卢联袂由渝飞京,邓氏当晚晋谒蒋院长报告川政并有所请示》,《中央日报》1937年3月19日第4版。

⑧ 《贺国光等昨谒蒋委员长,详陈刘湘拥护中央诚意》,《中央日报》1937年3月20日第3版。

⑨ 《刘湘禁所属无故警戒》,《中央日报》1937年3月21日第3版。

⑩ 《川旅京同乡对川事意见》,《大公报》1937年3月22日第3版。

载”，此次川省问题“殊不弱于陕西事件之发生，其较为不同者，蒋介石未被川刘所执也”，双方意见的关键“仅系乎入川宁军之撤退问题”。^① 息谣甚力的《大公报》在以大量篇幅报道贺邓卢辟谣之行的同时，亦于3月16日刊载：“川省部队十六日起集中若干团，自成都起至资阳止，二百四十里中，举行春季大演习两星期，并聘请行营高级职员评判。”《大公报》记者不禁起疑：“刘氏于此谣言繁兴时，突作春季演习，一方辟谣，而一方似又不免为造谣者添资料，殊令吾侪老百姓莫测高深也。”^②

3月26日，《大公报》特派员赴成都专访刘湘，“叩以川中情形”。刘湘表示，“月前重庆方面发生谣言，以其不足凭信，故未之理。谣言愈传愈甚，京沪各地友人纷纷函电询问真相。适蒋委员长在京，亦蒙来电询及，故省府特派邓汉祥赴京，晋谒蒋委员长”，“现接京电，谓蒋委员长对川情本已知之甚稔，经派员报告后，情形益见明瞭”，“谣言亦当即消散也”。刘继而言及川省旱灾，“谓省府对救济已用去一千余万元，尚希省内外各界速捐巨款助赈，尤望本报代为呼吁”，“川省今后决以建设救灾为努力中心，所有建设计划之推行，端赖中央及蒋委员长之指示与扶持”。^③

同日，《冀东报》则刊载：“相传李白两氏，三中全会以来，与四川刘湘结联反南京，府态度渐露骨”，蒋介石“于粤汉沿线集结约七师，采压迫广西之态度”。^④ 3月29日，该报进一步揭露：“川省事件，李白等确曾与谋，并订立倒蒋之秘密契约，已为蒋氏所悉。一般揣测，川省事件已非政治的力量所能和平解决”。^⑤ 未逾数日，该报的观察又变得扑朔迷离。“川刘态度暧昧不明，桂省之李白亦首鼠两端，粤之余汉谋亦被蒋介石所收买，故今后刘湘对宁府之意向，颇呈灰色状态。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等已由沪飞蓉，报告赴宁经过，大致宁府态度甚强硬，并将决定改编川军，其事与对付桂之李白如出一辙，川刘将来究以何法应付，尚难预料”。^⑥

上篇报道还透露，“张群吴鼎昌奉蒋命入川游说”，蒋“将派宁军之有力军人派何应钦氏随吴鼎昌入川，以调查宁川两军冲突事件为由，阴行其军事上之准备”。而据邓汉祥返蓉谒刘湘后，语记者云：“本人在京曾请求中央负责长官，随时来川指示，俾可声气相通，自不致有所隔阂，现吴部长已定三十一日飞川，何部长最近将作川游，张秘书长亦将返川一行，刘主席深表欢迎。”^⑦ 3月31日，不具军方背景的实业部长吴鼎昌^⑧在川人盛大欢迎中抵蓉。何应钦、张群则于4月1日分别复电刘湘，表示入川暂未成行。^⑨ 据吴语中央社记者：“此来系参加经济建设运动总会川分会成立，并与省当局商洽开发川实业问题”。吴在蓉期间除与刘湘晤谈，还提出川省唯有从事生产建设才有办法，但其两大前提为“第一应祛谣言，因谣诼频仍，将使外间投资者裹足不前；第二须由省当局事先有精密的计划，由中央加以审核”。^⑩ 4月5日，贺国光过鄂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会晤后返渝，并

① 《蒋介石已抵抗，有将飞川晤刘湘说》（1937年3月25日），《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第2页。

② 《贺国光邓汉祥等昨晋谒蒋委员长，报告刘湘拥护领袖并述川谣起因，蒋委员长指示今后川政方针》，《大公报》1937年3月20日第3版。

③ 《刘湘语本报记者，谓川谣当可消散，蒋委员长对川情极为明瞭，刘谈将致力建设救灾》，《大公报》1937年3月27日第3版。

④ 《川变秘幕揭开，李白等与刘湘联合反对宁府，蒋已向粤汉路增兵，林森将赴桂林游说》，《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第4页。

⑤ 《刘湘八项要求，蒋介石已表示接受》，《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第5页。文中“秘密契约”，似指刘湘与桂系、中共签订的《川、桂、红协定》。

⑥ 《川刘态度异常暧昧，何应钦将入川负指挥军事全责》（1937.3.31），《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第6页。

⑦ 《邓汉祥飞蓉，向刘湘报告谒蒋经过，据谈何应钦等将飞川》，《大公报》1937年3月30日第3版。

⑧ 吴鼎昌，四川人，被时人目为“政学系”成员，与杨永泰、邓汉祥有私交。1926年筹资重组天津“新记《大公报》”，1935年出任实业部后宣布辞去社长职务。

⑨ 《何张覆刘湘电》，《中央日报》1937年4月2日第3版。

⑩ 《吴谈开发四川两大前提》（天津《益世报》1937年4月1日），《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第8页。

称“即飞成都晤刘湘”。吴鼎昌于4月6日返京。同日,《中央日报》首度披露“中央对川六项办法,刘湘表示完全遵办”。^①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刘湘提请赈济川灾的提案^②,此时乃有实质进展。据中央社南京4月7日电,“最近财政部又续拨豫省急赈现款二十万元、工振款十二万元,川省公债一百万元,甘省现款十万元,并由各该省自筹振款,合力救济”。^③

4月14日,贺国光由渝赴蓉,访晤刘湘。《大公报》就贺国光此行评论曰:“中国各省除东三省外,经济力能自给地理形势优越者,以此两省为最”,川省“近虽曾有无稽之谣,一经解释,阴霾寝销。日来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由京到蓉,正与刘主席商洽调整川局之具体办法,预料今后之四川与中央联系亦更可加强程度。川粤两省形势如此,实为国家统一进步之征。”4月18日中央日报载:贺国光来蓉与刘湘迭次会晤,结果圆满。刘湘电呈蒋介石报告对中央所提六项办法的遵办情形,已令重庆附近驻军某部移防永川一带,并以川灾日益严重请再发行“川省赈灾公债千五百万”。宁方还发布消息,经当局允准,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定于十九日与财政部专员曹仲植,携中央赈拨川灾之公债一百万飞川施赈。^④几乎同时,重庆《大江日报》公布了川省民政厅的灾情调查结果:计受灾县份126县,灾民35087348人,尚有7县灾情“未悉”。^⑤随后,4月19日至21日的《新蜀报》和4月22日的《大公报》亦详细刊载了灾情数据及免粮情况。

4月21日,朱庆澜偕曹仲植等人乘中航机飞蓉,刘湘暨省振会全体委员、省府各厅处长均到机场迎候。嗣后,“川省赈会扩大组织,刘湘令财厅筹拨百万,办理急赈,该会主席杜文渊辞职,闻将以张澜继任”。该会并邀各县在蓉绅民开会,商决重灾轻灾县份之决定及查灾办法,由省派员分五路出发勘灾。重庆市救灾协会及绥署筹赈会均已成立,“全川各县办理救灾至忙”。^⑥自朱庆澜一行入川放赈后,川灾已引起全国各界的注意,“旅居各地之川同乡,因桑梓关系,关心尤切”。^⑦4月21日,上海川灾救济协会筹委会议决:(一)推代表向育仁等五人入京,恳请中央准发行救灾公债一千五百万元;(二)推定各界募捐负责人。^⑧平津四川同乡为筹募赈款,在津集议进行办法。除四川同乡外,参加者尚有曾在川省服务之政商务界十余人。会议决定以“平津救助川灾募捐处”名义代收捐款,“收得款项无论巨细均交天津大公报登录征信,集款每至千元,即汇交朱子桥(朱庆澜)先生散放灾区”。^⑨

4月26日,《大公报》报道川灾近况,“朱曹在蓉正审查灾区严重程度,全川灾区百二十八县,确系事实,川北以南部、仪陇、阆中为最重,此三县逃亡灾民达百余万,境内梧桐芭蕉均已吃尽;川东以忠县最重,其对岸掩埋灾民之大坑三月来计达八千余人,灾区儿童死亡数目尤不可胜计”。刘湘对灾情尤为焦急,“昨得开县电报下雨,欣喜若狂”。继蒋介石在贺邓卢辟谣之行期间表示关切川灾的姿态之后,行政院亦开始对救济川灾极重视,“现定本周召集关系部会,开会商讨具体救济办法。川省府请拨发赈灾公债千五百万元案,财部刻正飭公债司调查其所指定之基金数目,并研究其所拟

① 《贺国光返渝,中央对川六项办法,刘湘表示完全遵办,吴鼎昌今日飞京》《中央日报》1937年4月6日第3版。

② 刘湘等四委员提请的赈济四川旱灾案,当时被列入经济类交行政院,而甘灾和豫灾提案则被列为政治类交中政会详拟实施办法。参见《中央党务月刊》第103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37年2月印行,第77—79页。

③ 《财部赈济四省旱灾》载《大公报》1937年4月8日第四版。

④ 《刘湘向政院请求发行川赈灾公债,总额千五百万分九年偿还,朱庆澜明日飞川放赈》,《大公报》1937年4月18日第4版。

⑤ 益坚编:《四川旱荒特辑》第59页。

⑥ 《川财厅筹款百万,决先办灾区急赈,省府派员五路出发勘灾,各界动员奋起救灾》《大公报》1937年4月25日第4版。

⑦ 《平津川同乡募捐救灾川灾》《大公报》1937年4月25日第4版。

⑧ 《朱庆澜昨飞成都,促省府筹款百万》,《大公报》1937年4月22日第4版。

⑨ 《平津川同乡募捐救灾川灾》《大公报》1937年4月25日第4版。

发行办法,日内即可呈院核示”。^① 4月2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川灾救济运动》呼吁“救济川灾,正所以为国家消除西顾之忧,为国防保全重要之线,衡诸建国救国之大义,实亦国民所当为”。社评且举江西“匪祸”和长江大水为例,乐观抒论:“凡百灾害,善用之,正不难转祸为福”,四川“果能利用灾赈,督进造树,亦尽可以极少之金钱,成伟大之事功”。在日益浓郁的赈灾气氛中,川谣“已全平息”。^②

四

5月初,正值宁川双方就六项办法和赈灾公债的细节磋商渐入佳境之际,川省局势忽又急转直下。《大公报》5月15日重庆航讯透露,“上周发生少数省军黑夜击毙防守飞机场中央特务团士兵二名之事实,省军方面认为系迫匪流弹误伤之结果,而特务团方面则认为是袭取飞机场之尝试,此事使成都局面立刻严重”。^③ 此外,重庆市警察局长何北衡的更动,“实给中央方面以主要之刺激”。其实,早在4月中旬贺国光赴蓉期间,重庆警备司令与市长受行营直接指挥即为双方晤谈的重要事项。不料刘湘竟于5月3日条令重庆市警察局长何北衡另有任用,准予辞职,遗缺委王资军接充。^④ 而重庆某报于此局势尚属紧张之时,公布刘湘欲以与渝方中央人员摩擦最力之人许绍宗的参谋长王资军执掌重庆公安,在外界看来,此一举措“显有寓兵于警、暗谋大举之嫌”。于是,市面谣传警察长已换川军,中央人员群感不安,中央金融机关此时亦收缩信用,停止放款押款。虽然“何北衡十六日交代、十五日王资军则称病请缓交,故渝局最核心之刺激,大体已稍减轻”,但是“今日金融之紧迫达于极点,米价今日涨至五元余一斗,达空前之高峰”,贺国光一再召集金融界设法稳定市面,但局势尚不见好转。善于造势的《冀东报》以“川省风云突转紧张”的醒目标题登载:“宁府与四川间之交涉,月来信使往还,表面似已臻于顺利解决之境,实则内容主要问题,尚无具体结果”,“在川宁军贺国光部十四日晚奉到蒋氏命令,先锋队以成都为目标,积极挺进中。刘湘为避免冲突计,急令驻渝川军向后退却,一面急电蒋介石氏询问真象”。^⑤

川省内外新闻媒体对此反应强烈。引领全国舆论的《大公报》接连刊发社评,呼吁川省当局认清形势,服从中央,全力救灾,接受整军。4月中旬以来各方媒体对川灾的密切关注,转瞬之间汇聚成对川政的一片声讨。媒体认为,川灾并不始于今年,“只以去冬川局多谣,关系各方,心神别有所注,以致奇灾大劫无人重视,报纸鲜有揭载,省府迄未查勘,迁延复迁延,演成今日严重状态”。^⑥ 重庆金融界原与省府商妥百万赈款借款,却“因谣言关系,拒绝交付”。^⑦ 现在川灾已经引起川省内外注意,值此急赈的紧急关头,“何能再因谣言而以‘人灾’加重‘天灾’,以‘玩灾’演为

① 《川灾将愈趋严重化》《大公报》1937年4月27日第3版。

② 《川灾办法将定,朱庆澜周内飞甘,平津各界热心救川灾》,《大公报》1937年4月26日第3版。

③ 《灾深谣重的川局,物价飞涨斗米逾五元,一周来成渝谣诼的原因》,《大公报》1937年5月19日第3版。二三月间,宁川双方在成渝两地增筑工事,成都机场亦是敏感区域。参见《贺国光等电蒋中正成都机场四周工事嫌简单已令石团长赶即增筑并将所部主力秘密运动至机场附近防守等文电日报表》(1937年3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200480045。

④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月刊社1972年版,第8页。

⑤ 《川省风云突转紧张,宁军先锋队在挺进中,驻渝川军纷纷后退》(1937年5月16日),《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49册,第17页。

⑥ 《社评:川灾与川谣》《大公报》1937年5月17日第2版。

⑦ 《社评:川政与川灾》《大公报》1937年5月25日第2版。

‘误灾’，因此“息谣当与救灾并重”。^①

4月中旬后，财政部专员曹仲值、川省赈委会、新闻媒体等对灾区展开实地视察，地方政府在重灾之下竟然严厉催征税捐的行为因此不断曝光。^② 省府更因中央赈款延迟未发一事，广受舆论谴责。5月21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财政部拨发的川灾赈款公债100万元，4月6日已交由赈务委员会领收，顷接川省绅耆来电谓赈款尚未领得。“现闻川省府一面宣布已将该款分配清楚，而一面又令各县向各区税务督察处具领，以资划抵。无如各区皆以灾情奇重，税务短绌，一时无款可拨，振款因而无着。灾民离讯，极为恐慌”。^③ 省府截留中央赈款的消息，随着中央监察院暨赈委会令滇黔监察使任可澄赴川监放赈款，一时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尽管《中央日报》嗣后刊文证实，财政部已查明川灾赈款迟汇责任，“聚兴诚行、赈委会应分任其咎”，但是此事在川谣繁兴的非常时期显然使刘湘更加被动。^④

各方舆论不仅群相呼吁省府缓征田赋和减免税捐，并且纷纷提出“救灾只有裁军”。《成都快报》载文直陈：军队和军费的增加“是造成旱灾严重的最大原因”。^⑤ 《大公报》社评亦指出，川灾“病在军费太多”，“惟有敦恳刘主席为国为川，为救灾，统筹全局，就可能范围，确实核减军费”。^⑥ 更有文章认为：“军队国军化、政治统一化”是今后建设新四川的唯一目标，也是救济灾荒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⑦

表1 1937年川政与川灾之舆论一斑

文章标题	刊物名称	刊发时间或期数
《社评：救灾与整军》	天津《大公报》	1937—05—08
《社评：川灾与川谣》	同上	1937—05—17
《社评：川政与川灾》	同上	1937—05—25
《对于川灾之认识与救济》	同上	不详
《救灾与四川》	天津《国闻周报》	第14卷19期
《四川的悲喜剧》	天津《益世报》	1937—4—20
《建设与统一》	北平《独立评论》	第234号
《中央振款到那里去了》	上海《申报》	1937—5—21
《奠定四川之迫切》	上海《时事新报》	1937—5—28
《社论：川灾与人祸》	汉口《扫荡报》	1937—5—23

① 《社评：川灾与川谣》载《大公报》1937年5月17日第2版。

② 如乐至县正预征民国六十七、六十八两年的欠粮；北川县的粮户们因当局严征验契税，宁肯舍弃田产。参见长江：《川灾勘察记》（《大公报》1937年5月24日），《四川的悲喜剧》（《益世报》1937年4月20日）。

③ 《财政部查究川灾赈款，拨发已月余迄未发放》，《中央日报》1937年5月21日第3版。

④ 《川灾赈款迟汇责任，财部已查明呈报政院》，《中央日报》1937年5月27日第4版。此事逼迫刘湘以“近闻各地报章载有川省府扣留赈款之谣”为由，特地通电“各省市府并转各报馆”辟谣（《刘湘昨通电述川省办赈经过》，《中央日报》1937年5月25日第3版）。

⑤ 《救灾只有裁军》《川政与川灾舆论一斑》（出版地与出版年不详），第53—54页。

⑥ 《社评：救灾与整军》《大公报》1937年5月8日第2版。

⑦ 《川灾之剖析》，《川政与川灾舆论一斑》，第23页。

文章标题	刊物名称	刊发时间或期数
《任可澄谈救灾重在自救、裁兵、禁烟》	成都《新新新闻》	1937—6—5
《旱灾声中可注意之几个问题》	《成都快报》	不详
《川灾之剖析》	成都《统一评论》	第3卷18期

(说明:本表资料来源为《川政与川灾舆论一斑》。4至6月,国内的川事舆论达至高潮,不仅《大公报》尚有多篇社评、头条、短评和大量报道,《中央日报》《申报》、《益世报》等媒体对此也有十分密集的报导。故此,本表只能大致反映当时主要的川事言论及该书的编辑导向。)

这一时期,京沪两地为中心的旅外川人以川灾救济会名义,大张旗鼓发表救灾言论。5月6日,南京川灾救济协会举行茶会招待各界,正副会长张群、吕超、徐堪、邹琳及各机关代表陈长衡、邱甲等,与京新闻界共90余人到会。会上,财政部次长徐堪报告川灾公债迄未发行真相,要之中央无错,咎在刘湘。陈长衡发言,指陈四川兵员之多,较日本全国之常备军而过之,川灾实系“政治上率兽食人之结果”,“今日虽为讨论救灾,然为四川前途计,必须做到预算合理化及军令统一政治统一始克有济”。^①京、沪两地川灾救济协会的救灾言论,在媒体的广泛报导下,从旅外同乡的立场,对川省当局构成了特殊的道义压力。^②

在各方媒体借谣灾为题抨击川政的舆论声中,四川名人张澜恐怕是唯一公开质疑这种救灾舆论的川人。5月初,重庆银行载运现金东下,战争谣传纷起。张澜原为请求灾荒救济而来成都,“不料随着救灾发生的谣言,也一天一天地听入耳里”。张澜撰文刊于成都《新新新闻》报,表达救灾和息谣的个人意见。但这篇文章的后半篇未能发表,据其自言:因为我把四川这两年继续不断的发生谣言的背景,说得露骨了。有一位“行营”的朋友,请我不必披露,所以后半篇就以“待续”二字停止了。^③

谣灾交迫的省府主席刘湘,既对蒋介石“削藩”手段始终心防难消,又苦无正大名义拥兵自卫。即算欲以赈灾为名,移兵数十团殖边,不但宁方未予同意,在“国家中心论”的主流舆论中亦不成其为理由。非但如此,由于宁方分化瓦解和拖欠军饷,川军内部亦是分崩离析。川军将领杨森、孙震、邓锡侯、李家钰、王缙绪、范绍增等均与宁方暗通款曲,传递情报。^④七十四军军长李家钰即曾致电陈诚,陈述久留成都“一为欠饷,为甫方所扼”、“一因欲侦某方实况,从事特殊工作”。^⑤故此,贺国光劝告刘湘还政中央时,敢言“兄之部下,如不能根本抛弃妻财子禄观念,岂愿随兄亡命吃苦,况我亦可喊应三分之一乎!”刘湘此时的游移心态,贺国光谓其“绝非积极性谋反,实系消极性自卫;万一不幸破裂时,则将部队撤至川康边区,再行观变图存”^⑥,此番论断可谓入木三分。由是观之,随

① 《救济灾荒根本办法,将提下周行政院会讨论》,《大公报》1937年5月7日第3版。

② 上海川灾救济协会的救灾办法,详见《川灾会请刘湘实行救灾办法,沪各界以六项办法实为根本救治要策》,《申报》1937年5月12日第10版。

③ 张澜:《四川的救灾与息谣》(1937年5月7日),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④ 刘湘对所部军师长经中央派人联络而输诚并非不察。刘航琛回忆,刘湘曾向其出示川军将领通过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电台代发向蒋介石输诚的电报若干通。参见刘航琛述:《戎幕半生》附《刘航琛先生自订年谱稿》,第48页。

⑤ 《电呈委员长蒋抄呈李家钰文电请核示》(1937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石叟丛书》《文电甲类》(上册)。川军各军军费名义上虽由川康绥靖公署发放,实则操诸重庆行营财政监理处之手。据6月9日中央社电,财政监理处欠发川康军费达730万元,除去担保与贴现借款,实欠404万元(《益世报》1937年6月10日)。旁系川军以为欠饷系刘湘作祟,故军费由中央直拨,为其向中央输诚的经济原因,亦是川康整军的一大动力。

⑥ 贺国光:《剿匪安川与刘湘》(节自《八十自述》),《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年版,第195页。

着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加快国家统一进程,四川与中央的关系介于羈縻和直辖的混沌阶段,蒋刘二人不免各怀心防、动辄猜疑,双方各自搜罗的情报又时常刺激敌意的产生,乃至“愈疑愈备、愈备愈惧”、“愈惧愈备、愈备愈疑”^①,此为川谣繁兴的关键症结。

蒋刘心防有所松懈,贺国光功不可没。他一面以刘湘同学的身份向其核心幕僚刘航琛明白保证:“中央绝不会对他动手,请他千万不要疑神疑鬼”^②;一面电呈蒋介石,列举刘湘所作所为,“证明全系防卫性质,绝非准备犯上作乱”。贺甚至以生命担保,“如所陈不实不验,或误大事,届时请以贻误戎机,交军法治罪,即不杀我,亦必自杀”。^③ 5月19日,蒋介石手令贺国光负责整顿军纪、严惩骄横官兵。贺国光亦电呈蒋介石,报告刘湘对解决川局态度转变并将派刘航琛赴京。^④ 贺国光述及,当他将蒋责令其整顿中央驻川人员不法行为之电令转呈刘湘时,“彼异常感动,且欣然曰:‘足证彼辈行为,并非中央授意,全系私人妄动!’当即将电文照印数百份,分知其所属文武官佐;由是甫澄对委员长竭诚翊戴,而作风亦愈为改善矣”。^⑤ 5月20日,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携刘湘亲笔书信,与财政部特派员关吉玉偕同飞京,“向(蒋)委员长陈述刘湘不反情形”。^⑥ 5月28日,刘航琛在京招待新闻界,说明川谣由来“系因川省遵照中央所示六项办法,撤调川东驻军,一般奸人更肆簧鼓,谓为军事行动,谣言遂益炽”,现将刘湘拥护中央态度“分向蒋委员长及中枢当局陈述,备蒙剴切训示,均经电告刘主席,对根本奠安川局之整军办法,刘主席已复电完全接受。兼旬以来,谣言已一扫而空,此可告慰于新闻界者也”。^⑦ 此后,刘湘虽仍对整军心怀疑惧,但广阳坝飞机场和铜元局交由行营接管以及川康整军原则等关键事项毕竟渐次取得突破^⑧,而1200万四川省赈灾公债亦于6月24日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并通饬施行。

7月8日,何应钦在川康整军会议上宣布日军在卢沟桥进犯国军第二十九军经过,谓中日大战殆已不可避免,全场闻讯愤慨。^⑨ 8月14日,刘湘电请中央迁川,进行长期抗战。在其决意率军出川前夕,曾召集核心幕僚会议,慨言:今年春天发现了可以误解的谣言,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使我大澈大悟,必须我有破釜沉舟、奋勇前驱的表现,才可以使中央对我信之不疑。如果今天我不出川,中央将以我有盘踞地盘的心理,未必放心西迁。^⑩ 9月1日,川军先头部队分路出川参战。11月9日,刘湘自成都经陕飞京,主持第七战区筹组及出川川军抗敌事宜。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并昭示全国:“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⑪刘湘所言“一省生命与国家

① 《灾深谣重的川局,物价飞涨斗米逾五元,一周来成渝谣炽的原因》,《大公报》1937年5月19日第3版。

② 刘航琛述:《戎幕半生》第187页。

③ 贺国光:《剿匪安川与刘湘》(节自《八十自述》),《刘湘先生年谱》第195页。

④ 《贺国光等电蒋中正据报刘湘对解决川局态度转变决请宋子文来川说明并派刘航琛赴京求解决之道等文电日报表》(1937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200482099。

⑤ 贺国光:《剿匪安川与刘湘》(节自《八十自述》),《刘湘先生年谱》第195页。

⑥ 刘航琛述:《戎幕半生》附《刘航琛先生自订年谱稿》第47页。考诸庐山牯岭、川康整军等节以及当时报载刘航琛之行踪,文中所记“三月”实指1937年5月。

⑦ 《川整军方案将实施,具体办法短期内可决定》,载《大公报》1937年5月29日。

⑧ 广阳坝飞机场和铜元局分别为刘湘的空军基地和枪械厂。这两个军事设施一直是宁川双方的敏感事项,亦因之成为川谣的“资料”。

⑨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第17页。

⑩ 刘航琛述:《戎幕半生》第198页。

⑪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11—222页。

整个生命,息息相关”,至此竟成“四川省的生命,就是中华民国的生命”。^①

结 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天灾造成的社会不安和川军内部对利禄不保的惶恐,酿就了川谣繁兴的社会心态。素乏互信的中央与四川之关系则是点燃谣言的火种,一有风吹草动,难免谣言满天飞。蒋介石和刘湘之间围绕辟谣和息谣展开军政权力的博弈,赈灾亦成双方角逐的政治符号。借助主流媒体的息谣和救灾话语,宁方始终占据舆论高位,而刘湘则频频辟谣,疲于应付,几至国人唾弃的尴尬地步。客观而言,媒体指摘川政的救灾舆论,不少偏颇之处。但在天灾背后确实隐藏着战祸的危险情势之下,社会舆论对川灾重大灾情的广泛认可和省府救灾不力的抨击,正透射出外患紧逼中的国人恐惧人祸“内涝”的民族心理。7月7日卢沟桥枪声甫一响起,舆论中的川灾,迅即融入国难洪流,川灾的夸大和渲染乃成一场“美丽的谣言”。

(作者黎志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张群:《刘故主席湘功在国家》(1942.1.20),《刘湘先生年谱》,第184页。